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演变^{*}

郭梦焱

【摘 要】20 世纪 90 年代，冷战结束和“历史与记忆”论争的兴起，促使日本学界开始反思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口述史料的可信性，社会学的“对话建构主义”推动日本口述历史的重心由单纯强调验证事实逐渐扩展至理解叙述。进入 21 世纪，以日本口述历史学会成立为标志，日本口述历史在理论深化、跨学科合作与档案化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进展。然而，日本口述历史仍面临战争亲历者谢世、史料管理存在制度困境、学科专门性尚未确立、国际交流不足等多重挑战。日本口述历史实证主义和建构主义并行的路径、档案化与数字化的探索以及学科制度化的实践，为中国口述历史的理论整合与学科建设提供了比较研究的视角。

【关键词】日本口述历史 范式转换 档案化 学科专门性

【作者简介】郭梦焱，文学博士，日本神奈川大学外国语学部助手。

【中图分类号】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7-0114-15

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 19 世纪 90 年代的明治中后期，就出现了以速记和谈话笔记为代表的口述记录形式。这些早期的记录主要聚焦于政商界精英和知识分子，如福泽谕吉、涩泽荣一等，形成了以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交办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2025YZDJ003）的阶段性成果。

谈话记录为核心的口述历史传统，并一直延续至战后初期。^①

随着近代教育的普及，“文字文化”逐渐成为塑造日本社会的主导力量。战后的日本史学长期受实证主义史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这两大史学传统均强调文献史学的重要性，认为史料应反映客观事实。在此背景下，口述史料长期被视为文献史料的辅助，其史料价值未得到充分重视。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西方社会史与民众史研究思潮的影响下，日本学界开始倾听底层与边缘群体的声音，口述历史的研究与实践逐渐受到关注。这一时期的日本口述历史呈现“自上而下”的精英政治史与“自下而上”的民众史并存的特征。^②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日本口述历史经历了重要的范式转换，实证主义的历史观受到冲击，建构主义对口述历史的影响日益显著，叙述与记忆问题随之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相较对欧美口述历史的研究与译介，中国学界对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脉络与理论演变缺乏系统梳理，尤其是对 21 世纪以来出现的新趋势关注不足。^③

-
- ① 当时，东京帝国大学史谈会为反思明治维新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发起旧事咨询会，通过问答形式对旧幕府官员进行访谈，并将速记记录结集为《旧事咨询录》。参见旧事諮問会編：《旧事諮問録》第 1~7 編，旧事諮問会 1891—1892 年版。
- ②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日本的口述历史经历了由经验记录到方法论自觉的转变。20 世纪 50—60 年代，围绕战争经历的口述记录采集逐渐展开，其早期对象主要包括政府官员、军人及侨俘（日本侨民与战俘）等群体；此后，研究视野逐渐扩展至曾受日本殖民统治、军事占领及战争动员影响的亚洲各地民众与劳工。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经济高速增长与“自下而上”的历史研究兴起，女性史与民众史逐渐受到重视，女性、劳工及其他此前较少进入正统历史叙述的群体，开始通过口述方式记录自身经验。宫城聪等的《冲绳战记录》（《冲縄県史》第 9 卷各論編 8《冲縄戦記録 1》，琉球政府 1971 年版）、本多胜一的《中国之旅》（《中国の旅》，朝日新聞社 1972 年版）等作品开创了日本战后口述实践的新局面，也引发了对“加害者记忆”与史实真实性的讨论。20 世纪 80 年代，吉泽南、中村政则等学者进一步强调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关系、叙述互动及主体性问题，推动口述历史由单纯的资料收集向理论反思过渡，为 20 世纪 90 年代的“记忆研究”奠定了思想基础。
- ③ 中国学界对日本口述历史的关注较少，相关文章和报告则更为少见。在 2024 年 8 月 31 日至 9 月 1 日召开的“本土化与规范化：中国口述历史的再出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马场公彦在其主旨演讲《口述史：以“我”为主语的历史研究》中，总结了口述历史在战后日本中国研究中的发展与运用，并从自身的编辑工作经验出发，强调了在口述历史中直接参与访谈的“我”的重要性，但极少涉及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笔者在分组会议中提交了《日本口述历史研究的沿革与现状》一文，梳理了自明治时期至今日本口述历史发展各个阶段的代表性著作和研究项目，但未触及理论与研究范式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系统考察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口述历史的理论演变及其社会文化背景,重点探讨21世纪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特征。

一、20世纪90年代日本口述历史的范式转换

20世纪80年代末,在中村政则、吉泽南等学者的推动下,日本口述历史步入方法论反思阶段。^①学者们从理论层面重新审视口述史料的性质及其与历史叙述的关系,并逐渐关注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互动及其对历史认识的影响。^②由此,日本口述历史的关注重点由对客观事实的核验,逐渐扩展至对叙述与记忆生成机制的思考。

经过20世纪80年代的理论积淀,日本的口述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方法论的真正转折。冷战结束与全球范围内重新审视历史的思潮,使被压抑的战争记忆重新浮现,“历史与记忆”成为国际学界的核心议题。在日本,这一思潮的兴起与“慰安妇”诉讼及历史修正主义论争密切相关。1991年,曾被强征为日军“慰安妇”的金学顺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要求道歉与赔偿。该事件使“慰安妇”问题成为日本社会瞩目的焦点。金学顺的证言不仅引发了日本社会对“受害与加害”的反思,而且推动了日本学界重新思考口述证言的史料地位。

在这方面,中村政则于2003年发表的《语言学转向后的历史学》是具有

① 1987年,日本历史学研究会举行了一系列以口述历史为主题的研讨会及座谈会[如“专题讨论会:口述历史——意义、方法与现状”(“シンポジウム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その意味と方法と現在”)、“座谈会Ⅰ:从《妻子们的二·二六事件》到《记录:中途岛海战》——围绕泽地久枝女士展开”(“座談会Ⅰ《妻たちの二・二六事件》から《記録 ミッドウエー海戦》まで——澤地久枝氏をかこんで”)、“座谈会Ⅱ:从新几内亚高地到南京——围绕本多胜一先生展开”(“座談会Ⅱニューギニア高地から南京へ——本多勝一氏をかこんで”)],并在《历史学研究》上刊发了特集《口述历史:意义、方法与现状》(《歴史学研究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その意味と方法と現在〈特集〉》第568号,1987年),引发了日本学界的热烈讨论。

② 大门正克在总结吉泽南的研究时指出:“在口述访谈的实践中,研究者总是通过与个体的对话、交流与思想交锋来推进研究进程。这样的过程不仅涉及资料的收集,还包含研究者与受访者的互动、理解与反思。由此形成的历史叙述,往往会将研究者自身认识的变化及其思考过程一并纳入,呈现一种动态的、生成性的历史理解。”见[日]大门正克:《語る歴史、聞く歴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現場から》,岩波書店2017年版,第204~205页。

代表性的研究。该文主要围绕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口述史料的可信性与历史学者的主体位置等问题展开论述。换言之，中村关注的重点在于历史事实应当如何被认识，口述史料能否成为历史认识的有效依据，以及历史学者应当如何通过史料批判与学术讨论不断接近历史事实。^①

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关系到历史认识何以可能，口述史料的可信性则直接影响口述证言能否被纳入历史研究。二者共同构成了围绕“慰安妇”证言、历史修正主义展开争论背后的认识论与史料学问题。因此，下文先从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口述史料的可信性入手，分析口述证言作为历史资料的可能性及其限度；至于历史学者的主体位置问题，则将在后文有关叙述建构和访谈关系的讨论中予以揭示。

首先是历史事实的客观性问题。中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回应上野千鹤子等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在语言学转向和建构主义的影响下，社会科学开始从认识论层面重新审视“什么是客观事实”。正如上野千鹤子在《民族主义与性别》中所言：“历史中既没有‘事实’（fact），也没有‘真实’（truth），只有从特定视角提出问题，进而重新建构的‘现实’（reality）。”^②这种观点冲击了战后日本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坚持的“文献史料反映了客观事实”的认识。^③基于此，上野认为，在仍有亲历者在世的近现代史领域，口述历史是发掘被认定为“事实”的历史背后隐藏的“另一种现实”的重要途径。^④

其次是口述史料的可信性问题。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等历史修正主义团体妄图借“重审历史”之机“修正历史”。他们打着“自由主义史观”的旗

① 参见〔日〕中村政则：《言語論的転回以後の歴史学》，《歴史学研究》第779号，2003年，第29~35页。

② 〔日〕上野千鹤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 新版》，岩波書店2012年版，第3页。

③ 针对上野千鹤子的批判，中村政则既承认口述证言确实可以推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又不赞同上野将历史学者简单等同于重视公私文书、轻视口承与证言的实证主义者。中村强调，公文书、私文书、口承与证言之间并不存在预先设定的序列，各类史料应当被等而视之，其具体使用方式则取决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以及研究主题、方法与叙述方式。参见〔日〕中村政则：《言語論的転回以後の歴史学》，《歴史学研究》第779号，2003年，第29~30页。

④ 参见〔日〕上野千鹤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 新版》，岩波書店2012年版，第5页。

号,主张摒弃战后日本的“自虐史观”,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问题的存在。历史修正主义者质疑金学顺等人证言的可信度,认为其缺乏文献佐证,并企图将“慰安妇”问题的焦点转向是否存在强制性。这种立场不仅回避了战争责任与战后处理问题,而且暴露了将文献史料绝对化的史料观在方法论上的局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围绕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口述史料的可信性展开的论争中,实证主义史学和历史修正主义虽在政治立场和历史认识上截然不同,在将文献史料佐证视为判断口述史料价值的重要尺度这一点上,却呈现某种方法论上的相似性。建构主义则对此种以文献史料为中心的认识提出批判。基于女性史、民众史的研究积累与口述历史的实践,上野千鹤子认为,文献史料之间的顺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研究者选取特定视角进行阐释的结果。^①以金学顺等人的证言为契机,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叙事框架实现了从“受害者的耻辱”到“加害者的性犯罪”的角度转换。这种叙述角度的变化不仅重塑了公众记忆,而且推动了吉见义明等学者对文献史料的再发掘。^②换言之,口述史料并非只能等待文献史料的验证,从中也能够提出新的问题,进而推动对文献史料的重新发掘与阐释。^③

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以樱井厚主张的“对话建构主义”为代表的社会

① 参见[日]上野千鹤子:《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ジェンダー 新版》,岩波書店2012年版,第171页。

② 在听取“慰安妇”证言后,吉见义明痛切质问:“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意识到了‘慰安妇’问题是对女性的严重人权侵害,是具有国家犯罪和战争犯罪性质的行为?”此后,他通过搜集整理文献史料中有关从军“慰安妇”的记录,指出“慰安妇”制度是在日本军部指导下实施的系统性人权侵害。参见[日]吉见义明:《従軍慰安婦》,岩波書店1995年版;[日]吉见义明、林博史編著:《共同研究 日本軍慰安婦》,大月書店1995年版。

③ 中村政则从历史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回应了上野的挑战,他指出:“语言学转向解构了实证主义史学能够书写出唯一而客观的历史真相(the history)这一神话,同时表明历史学家的中立性、客观性并非不证自明,而是需要不断接受审视。后现代主义促使人们反思历史叙述的方式,向战后历史学提出了立场性问题:谁在叙述历史,向谁叙述,从什么立场叙述……最为重要的是,历史是通过书写而成为历史的。一切都必须通过话语来表达,这就迫使历史学对何为史料、何为事实进行深刻的再检讨。”见[日]中村政则:《言語論的転回以後の歴史学》,《歴史学研究》第779号,2003年,第34页。

学理论，为日本口述历史提供了新的发展路径。^① 尽管历史事实的客观性与口述史料的可信性仍然是历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但日本口述历史开始进一步关注受访者的主体性，即关注受访者如何在回忆中叙述、阐释与构建自身经历，探究受访者沉默背后的“不可言说”，以及叙述如何在访谈者与受访者的互动中生成。

人见佐知子在《口述历史与历史学 / 历史家》一文中总结道：“（这一时期的口述历史）关注的焦点不再是叙述内容是否符合事实以及能否得到实证，而是转向叙述方式和访谈场景，以及叙述如何通过受访者与访谈者的‘对话’，作为一种互动行为而被‘建构’。”^② 尽管实证主义传统在历史学界仍占据主导地位，但建构主义的兴起促使学界重新思考史料、叙述与记忆之间的关系。这一理论变化标志着日本口述历史的重心由单纯强调验证事实逐渐扩展至理解叙述，为其 21 世纪“记忆研究”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二、21 世纪以来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与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末，日本的口述历史主要聚焦于地方事件和战争记忆的收集与整理。进入 21 世纪，在继承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日本口述历史呈现新的发展特征。以 2003 年日本口述历史学会^③ 的成立为标志，口述历史逐渐从个

① “对话建构主义”既关注访谈内容如何在访谈者和受访者的互动中编织而成，也重视访谈内容在访谈者和受访者所处的社会语境中承载的意义。参见〔日〕桜井厚：《インタビュー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の聞き方》，せりか書房 2002 年版，第 28~31 页。

② 〔日〕人見佐知子：《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歴史学 / 歴史家》，歴史学研究会編：《第 4 次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第 3 巻 歴史実践の現在》，績文堂 2017 年版，第 134 页。

③ 日本口述历史学会（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学会），英文全称 Japan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简称 JOHA。该学会致力于“研究访谈和音频史料更为妥善的保存、收集与使用方法，统筹考虑对各种媒体的使用，并为从事方法论研究与口述历史实践的人士搭建跨领域交流平台，以期深化对口述史料的理解”（参见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学会：《趣意書》，<http://joha.jp/joha>，2026 年 1 月 7 日）。该学会从 2006 年起创办学会志《日本口述历史研究》，迄今已出版 20 期。刊文内容涉及劳动者、女性、华侨与战后遗留中国的日本孤儿等群体，涵盖战争、疾病与自然灾害经历等各种主题，在为口述历史研究者提供学术交流平台的同时，进一步拓展了日本口述历史的边界。

体化实践走向制度化发展,表现为理论探讨的深入、跨学科合作的加强与国际学术交流的扩大。同时,口述历史还融入大学与中学的教育实践,学生参与度明显提高。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口述史料的档案化、数字化及面向公众的开放利用也日益受到重视。

(一) 口述历史理论的深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口述历史理论的深化以对社会学理论的借鉴为先导。樱井厚的“对话建构主义”强调,在口述访谈中,叙述并非由受访者单方面完成,而是由访谈者与受访者在“对话”中共同生成。这一理论促使研究重心从关注“叙述了什么”转向“如何叙述”及“为何如此叙述”,并进一步关注叙述背后的社会语境和意义生成机制。也就是说,日本口述历史在重视事实核验的同时,开始重视叙述的社会意义。在这一理论的直接影响下,历史学者开始重新审视访谈者自身的作用。访谈者不再是中立的记录者,而是叙述的参与者和共同建构者。这一转变对以史料能够客观反映历史事实为前提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提出了挑战。

2003年,保苺实提出“激进的口述历史”概念,对实证主义史学传统进行了根本性的批判。他主张:第一,历史叙述并非由研究者单向书写,而是在倾听—对话—反思的互动中生成的;第二,应承认叙述的多重性与交错性,在记忆的生成过程中不存在唯一的“真实”;第三,口述历史应成为社会参与和社会批判的实践,而不仅仅是史料积累的技术手段。^①保苺强调的“激进的口述历史”并非政治口号,而是一种方法论自觉——要求历史学者反思口述历史的研究方式,将口述访谈理解为对话过程而非事实再现。这一立场推动了建构主义取向进一步嵌入日本口述历史,并对后续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保苺的理论相呼应,大门正克进一步指出,历史学者在解读口述史料的过程中受到三重制约:其一,口述史料及由此推导出的“事实”;其二,口

^① 参见[日]保苺实:《誰が歴史家なのか——ラディカル・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史資料ハブ:地域文化研究》第2号,2003年,第57~65页;[日]保苺实:《ラディカル・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オーストラリア先住民アボリジニの歴史実践》,御茶の水書房2004年版。关于保苺问题意识的产生,参见[日]野上元:《歴史が聞こえてくること:方法的ラディカリズムと歴史への愛》,《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3号,2017年,第7~18页。

述史料关联的整体社会现实；其三，作为访谈者的“我”的主观性。^① 大门强调，尽管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形成方式有所不同，但二者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差异；研究者均须结合现实与个人认识，对史料进行选择 and 解读，故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在方法论层面具有本质上的共通性。人见佐知子进一步指出，历史学者在处理口述史料时不能回避作为访谈者的“我”的主观性。由于访谈者通常就是历史学者本人，其既要分析受访者的叙述，又不得不直面自身的主体位置与主观性，故而有必要将“我”一并纳入分析框架。^② 由此，如何正视作为访谈者的“我”及其主观性便成为日本口述历史的重要议题之一，也促使日本学界进一步反思历史叙述的主体结构。

社会学的“对话建构主义”虽极大地丰富了日本口述历史的方法论，但也导致社会学与历史学的口述历史研究之间产生了一定分歧。在史料处理、伦理原则与叙述方式等方面，二者的立场并不一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争论之一便是实名与化名的使用问题。樱井厚认为，化名的使用有助于保护受访者的隐私，使其更自由地叙述，避免现实生活中的潜在风险。^③ 人见佐知子则指出，当历史学者致力于叙述那些拥有具体姓名、真实生活的人的历史时，化名的使用会造成“违和感”，削弱叙述的历史感与真实感。^④ 兰信三进一步指出，这一争论在实质上反映了建构主义与实证主义之间的认识论分歧。^⑤ 实证主义史学重视叙述内容能否得到相关史料的佐证，而建构主义则更关注叙述的生成过程及其社会意义。实名与化名之争由此超出了单纯的伦理或技术选择范畴，而进一步推及口述史料如何兼顾事实核验、受访者权益

① 参见〔日〕大门正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实践と同時代史研究への挑戦——吉沢南の仕事を手がかりに》，《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 589 号，2007 年，第 11 页。

② 参见〔日〕人见佐知子：《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歴史学／歴史家》，歴史学研究会編：《第 4 次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第 3 卷 歴史実践の現在》，績文堂 2017 年版，第 137 页。

③ 参见〔日〕桜井厚：《インタビューの社会学——ライフストーリーの聞き方》，せりか書房 2002 年版，第 60 页。

④ 参见〔日〕人见佐知子：《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歴史学／歴史家》，歴史学研究会編：《第 4 次 現代歴史学の成果と課題 第 3 卷 歴史実践の現在》，績文堂 2017 年版，第 140 页。

⑤ 参见〔日〕蘭信三：《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展開と課題——歴史学と社会学の狭間から》，〔日〕大津透、桜井英治、藤井譲治等編：《岩波講座日本歴史 第 21 卷 史料論〈テーマ巻 2〉》，岩波書店 2015 年版，第 240 页。

与叙述意义等方法论问题。正是在这种跨学科的争论中,日本口述历史不断重新审视事实核验、叙述建构与研究主体之间的关系,并推动相关方法讨论不断走向深入。

(二) 口述政治史: 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交汇

日本的口述政治史由来已久。早在明治中后期,就出现了对军政商界精英进行速记访谈的做法。此类以精英为中心的口述政治史研究,在战前、战时与战后各个时期都有相应的学术组织推动,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传统。进入20世纪90年代,“战后政策回顾研究会”等团体继续以政治人物与政策决策过程为研究重点,积累了大量访谈与文献资料,延续了“自上而下”建构“政治记忆”的传统。^①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御厨贵与伊藤隆的推动下,口述政治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他们依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开展的“C.O.E. 口述历史·政策研究项目”,在2000—2005年对150多位政治家和官僚进行了逾千次访谈,广泛涉及行政、法律、经济等领域,以及海外拓展、冲绳问题等专项议题。^②

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御厨贵与伊藤隆对口述政治史的方法论进行了系统反思。御厨贵将口述历史定义为:“由专业人士制作、面向公众的公共人物的口述记录。”^③他认为,这种对研究对象的限定并非排他性选择,而是体现了一种策略性立场——其目的在于向以文献史料为核心的政治史学界证明口述史料的学术价值。伊藤隆则总结出口述史料的三大优势:“首先,口述史料

① 参见[日]伊藤隆:《歴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585号,2007年,第2~6页。

② “C.O.E. 口述历史·政策研究项目”的日文全称为“C.O.E.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政策研究プロジェクト”,由日本文部省提供资金支持。C.O.E是“Center of Excellence”的缩写,直译为“卓越中心”。访谈对象既有政界人士,如前内阁总理大臣海部俊树、宫泽喜一,前驻美大使栗山尚一,前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等,也有来自松下电器、索尼、丰田汽车等企业的经济界人士。

③ [日]御厨贵:《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現代史のための口述記録》,中央公論新社2002年版,第5页。尽管御厨贵稍后进行了修正,将“公人”(公共人物)的范围扩展到市井平民,但其定义仍然极具争议。女性史研究者仓敷伸子表示从定位和立场上都无法赞同御厨贵的定义,社会学者樱井厚则直言该定义是错误的。参见[日]仓敷伸子:《女性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588号,2007年,第15页;[日]桜井厚:《ライフストーリー論》,弘文堂2012年版,第15页。

的最大优势在于可以直接向受访者提问并获得答复，并且能够根据回答继续追问，这与文献史料的单向性特征形成鲜明对比。其次，不仅可以请受访者解释文献史料的背景和含义，还有可能了解到文献史料未曾记载的许多事实，包括事件背后的人际关系等信息。最后，访谈过程还可能促使受访者提供相关文献史料。”^① 然而，他同时指出，这些优势并不能改变口述史料相对文献史料的次要地位。^② 正如共同经历的事情因人而异会有不同的记忆，记忆本身天然具有重构性和选择性。人类总是在新的环境下重新整理自己的过去，根据当下的情境和价值观重新诠释记忆，将不合时宜的部分排除，尤其是在社会价值体系发生巨变（如战败）的情境下，记忆的重释与遗忘尤为显著。^③

由此可见，御厨贵与伊藤隆的研究体现了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对日本口述政治史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强调对口述史料的核实与验证，延续了战后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传统；另一方面，他们又承认叙述与记忆受社会语境和访谈关系的制约。这种方法论上的双重取向，反映了日本口述政治史实证与解释并行结合的特点。

（三）跨学科的口述历史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学与历史学在日本口述历史的理论和方法方面展开了深度互动。进入 21 世纪，跨学科合作成为日本口述历史的重要发展趋势，后者的研究领域由此拓展至民俗学、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护理学等学科，并在不同学科的共同研究与实践中形成了新的方法论视野。

2007—2011 年，日本甲南大学人间科学研究所开展的“战争的儿童”科研项目，堪称心理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合作的典范。^④ 该项目最初由心理学研

① [日] 伊藤隆：《歴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 585 号，2007 年，第 1 页。

② 对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的价值及其相互关系，伊藤隆后来做了进一步说明。2013 年，他指出，口述史料可以补充文献史料的不足，尤其有助于揭示文献中未被记载的人际关系、事件背景及当时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实前提。不过，他同时强调，口述史料仍须尽可能通过文献史料或其他材料加以印证。参见 [日] 伊藤隆、聞き手小池聖一、石田雅春：《記録 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ということ》，《広島大学文書館紀要》第 15 号，2013 年，第 2~3 页。

③ 参见 [日] 伊藤隆：《歴史研究と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第 585 号，2007 年，第 9 页。

④ 参见 [日] 森茂起、港道隆編：《〈戦争の子ども〉を考える——体験の記録と理解の試み》，平凡社 2012 年版。

究者发起,以与德国相关研究进行比较为出发点,通过问卷与访谈调查的方法,考察日本阪神地区(大阪、神户地区)战争时期儿童的创伤经历、家庭内部如何谈论战争、战后生活等情况,以及受访者对日本“加害国”与“受害国”身份的认识。项目第一阶段主要由临床心理学和精神医学研究者负责,重点记录和分析受访者的战争创伤及其后续影响。^①第二阶段,历史学者开始参与访谈,并对既有调查资料、访谈提纲和问卷内容进行检讨与修订。第三阶段,项目所有参与者在此前合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心理学和历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的互补性与差异性,从而实现对战争经历的跨学科再阐释。^②

此外,口述记录在社会福利学与护理学领域也被广泛应用。六车由实在养老机构工作期间开展的口述实践,突破了照护者与被照护者的身份界限,将老人视为“拥有完整人生的个体”。正如大门正克所言:“在这一过程中,服务对象不再仅仅是被照护的人,而是各自人生的主体,并在彼此之间获得认可。”^③此类以口述记录为媒介的交流实践,显示出口述历史在超越学术研究、彰显社会关怀方面的巨大潜能。

(四) 口述史料的档案化与数字化

日本在口述史料的收集与保存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一方面,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保存有大量战中与战后的访谈速记,对研究彼时日本的政治决策与社会动向具有重要史料价值;^④另一方面,宫城聪等于1969—1971年开展的“冲绳战证言记录”项目,将冲绳岛战役亲历者的口述录音系

① 参见[日]森茂起:《子ども時代の戦争体験——心理学的調査から》,《心の危機と臨床の知》第11卷,2010年,第12页。

② 参见[日]人見佐知子:《趣旨説明》,《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4号,2018年,第65~67页;[日]森茂起:《戦争体験の聞き取りにおけるトラウマ記憶の扱い——歴史学と心理学の協働の試み》,《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4号,2018年,第69~81页。关于历史学者参与的情况,参见[日]人見佐知子:《〈戦争の子ども〉から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を考える》,《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4号,2018年,第83~93页。

③ [日]大門正克:《語る歴史、聞く歴史——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現場から》,岩波書店2017年版,第219页。

④ 关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保存的口述历史资料,参见[日]藤田壮介:《憲政資料室所蔵の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関連資料》,《参考書誌研究》第78号,2016年;国立国会図書館憲政資料(憲政資料室),<https://ndlsearch.ndl.go.jp/rnavi/kensei>,2026年1月7日。

统化归档，留下了 259 份证言录音资料和 112 件县史原稿。^① 这些早期的口述资料保存工作，为日本后来的口述史料档案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进入 21 世纪，日本的口述史料档案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提及的御厨贵等主持的“C.O.E. 口述历史·政策研究项目”。该项目以“面向公众的口述记录”为理念，从启动之初就充分考虑了访谈资料的保存与公开问题；截至 2005 年，共整理出版 90 余册研究报告与访谈记录，建立了当时日本学界规模最大、制度化程度最高的口述历史档案体系。此后，东京外国语大学、饭田市历史研究所等高校和地方研究机构也相继开展口述史料的整理与利用工作，带动了地方层面的口述史料档案化建设。^②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日本口述史料的数字化与网络公开取得新进展。岐阜女子大学建立的数字档案库收录了包括文部省前事务次官木田宏在内的多位政治家、学者的访谈资料，涉及地域文化、教育、民俗等主题。^③ 日本放送协会（NHK）建立的“NHK 档案库”设有“战争证言档案”栏目，集中公开了大量与战争经历相关的访谈录像。^④ 昭和馆数字档案库则汇集了 340 余段口述访谈录像，涵盖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主题。^⑤ 在这些数字化口述史料中，受访者虽立场各异，但共同构成了研究日本战争“历史与记忆”的重要基础性资源。

在实践之外，日本学界也开始重视口述史料档案化的理论与制度研究。中岛康比古从口述史料管理的制度层面切入，探讨了口述记录（录音与速记）的

① 《宫城聪文书》现保存于冲绳县公文书馆，关于宫城聪资料及冲绳岛战役证言记录的保存与利用，参见〔日〕久部良和子：《冲绳戦証言記録の公開について——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活用を試み》，《冲绳県公文書館研究紀要》第 13 号，2011 年，第 25~41 页。

② 参见〔日〕蘭信三：《はじめに》，《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 15 号，2019 年，第 57~58 页；〔日〕安岡健一：《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を受け継ぐために》，《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 15 号，2019 年，第 61~69 页。

③ 参见岐阜女子大学デジタルミュージアム，<http://dac.gijodai.jp/>，2026 年 1 月 7 日。

④ NHK 档案库保存着自电台广播以来约 90 年间和自电视开播以来约 60 年间制作的节目、脚本，以及与节目有关的记录和用于制作节目的材料。参见 NHK アーカイブス，<https://www.nhk.or.jp/archives/>，2026 年 1 月 7 日。

⑤ 昭和馆收集和保存着有关日本战时、战后国民生活的历史资料，昭和馆数字档案库可以浏览部分馆藏资料。参见昭和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https://search.showakan.go.jp/search/oralhistory/>，2026 年 1 月 7 日。

保存期限、保存内容的评估筛选、记录方式与记录介质的选择,以及口述史料公开和利用的权限等多个关键问题。他强调口述史料的档案化建设不应仅依赖政府的公文书馆,而须图书馆、大学及民间机构协同参与。^①长谷川贵志则在探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实施口述历史项目的制度基础与业务流程时,指出其尚面临四项课题:其一,如何妥善处理著作权关系,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及权益;其二,如何解决录音、影像数据的媒介耐久性问题,并确定合理的口述史料保存期限;其三,如何建设口述史料公开与利用的管理机制,包括规范未公开记录的申请程序、明确到期资料的使用规定及网络发布方式;其四,如何建立由相关专家参与的项目评估机制,从法律、伦理和技术等方面对项目进行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用于项目后续工作的改进。^②

尽管日本在口述史料档案化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但整体上仍存在多重制约。一是重视“对话建构主义”的社会学取向与档案化在方法论诉求上并不完全一致。社会学取向的口述历史重视叙述的流动性与情境性,而档案化则要求口述史料具有相对稳定的形态,以便长期保存和重复利用。这种差异使日本学界对口述史料应当如何保存和再利用存在不同认识。二是专门性的口述历史档案机构数量偏少,加之多数高校和研究机构缺乏统一的保存标准与长期运行机制,导致档案体系呈现碎片化特征。三是著作权与隐私保护问题悬而未决,受访者的权利界定不清,致使许多资料难以公开。四是数字化进程缓慢。受制于经费与人力不足,日本口述史料数字化的覆盖范围与实施规模仍较为有限。综上所述,如何在学术规范、技术条件与伦理原则三方面实现平衡,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口述历史档案体系,已成为当代日本口述历史亟须关注的核心课题。

三、日本口述历史存在的问题与相关思考

本文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口述历史的发展演变。总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战后日本的实证主义史学传统受到冲击,日本口述历史的

① 参见[日]中岛康比古:《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アーカイブ——可能性と課題》,[日]御厨贵编:《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入門》,岩波書店2007年版,第101~120页。

② 参见[日]长谷川贵志:《国立公文書館におけ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事業の実施に向けた一考察》,《北の丸:国立公文書館報》第50号,2018年,第51~52页。

重心从单纯强调验证事实逐渐扩展至理解叙述，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特别是“对话建构主义”）为口述历史提供了新的分析框架。进入 21 世纪，日本口述历史呈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既在理论层面实现了深化，又在实践层面通过跨学科合作与数字化建设得以拓展。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不仅进一步拓展了口述历史的边界，而且为口述历史的实践应用开辟了新的路径。然而，日本的口述历史仍面临若干突出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随着战争亲历者相继离世，如何采集和保存这一代人的口述史料成为紧迫课题。战后出生的“非经验世代”逐渐成为记忆叙述的主体，其记忆不再基于亲身经历，而更多源自家庭、学校与媒体的二次叙述。日本口述历史由此必须重新思考“记忆的继承”与“和平理念的传递”问题。^①

第二，口述史料的档案化与数字化仍面临制度困境。日本社会对个人隐私与著作权的高度重视，使口述史料的公开利用受到严格限制。加之口述史料本身具有声音与影像等多重信息形态（语调、节奏、沉默、表情、姿态等），这在技术适配和伦理规范层面对其保存与再现均提出了更高要求。

第三，尽管日本口述历史已发展出跨学科研究的广阔空间，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专门性尚未完全确立。长期以来，口述历史常被视为历史学或社会学的分支之一，而非一门独立的学科。学科定位的模糊，使口述历史在伦理规范、访谈标准、资料保存与利用等方面始终缺乏统一的学术准则。安冈健一指出，要确保口述历史作为学术领域的独立性，必须在学会层面形成共识、确立操作标准，构建具有制度支撑的口述历史研究共同体。只有确立学科专门性，口述历史才能在面对伦理审查、隐私保护与社会应用等外部压力时，保持方法论的独立性与研究的连续性。^②

第四，国际交流与共同研究仍显不足。尽管日本口述历史学会同欧美的口述史学界保持着一定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但在东亚地区，各国及地区之间

① 关于继承战争记忆的讨论，参见〔日〕今野日出晴：《“戦争体験”、トラウマ、そして、平和博物館の“亡霊”》，〔日〕蘭信三、小倉康嗣、今野日出晴編：《なぜ戦争体験を継承するのか——ポスト体験時代の歴史実践》，みずき書林 2021 年版，第 401~432 页。

② 参见〔日〕安岡健一：《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専門性”》，《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 19 号，2023 年，第 40~41 页。

的学术互动仍处于起步阶段。^① 如何通过跨地域比较深化对战争记忆、社会变迁与身份叙述的理解,是今后研究的重要方向。^②

对中国口述历史而言,日本的经验与问题具有镜鉴意义。其一,日本口述历史在处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方法论分歧方面,发展出实证主义与建构主义并行的研究路径,提供了一种理论整合的可能性。其二,在口述史料档案化与数字化建设方面,日本的经验表明,技术、制度与伦理三方面的协调是口述史料长期保存与开放共享的关键。其三,日本学界围绕口述历史“专门性”展开的讨论,显示了可供对照的问题意识。当前,中国口述历史同样面临学科定位模糊、研究者专业素养不均、学术伦理与方法标准尚未统一等问题。日本学界通过学会制度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共同体的建设,尝试确立独立的学术规范与研究标准,这一制度化实践为口述历史的学科建设提供了参考案例。其四,日本口述历史在战争记忆、地方史与女性史等议题上的研究实践,展现了从主题设定到方法运用的多元路径,对思考口述历史的学科边界及其社会功能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张梦晗)

① 2022年9月,第20届日本口述历史学会大会特设“东亚地区口述历史的展开与课题”专题研讨会,韩国的尹泽林、中国台湾地区的许雪姬与日本的兰信三分别介绍了所在国家或地区口述历史的发展状况。2023年,三人的报告发表于《日本口述历史研究》特集《东亚地区口述历史的开展与课题》(《東アジアにおけ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口述史の展開と課題》)。参见[韩]李洪章:《特集にあたって》,《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9号,2023年,第45~47页;[韩]尹泽林:《韓国口述史の軌跡と展望》,[韩]金理花訳,《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9号,2023年,第48~60页;许雪姬:《第二次世界大戦後における台湾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発展》,[日]坪田=中西美貴訳,《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9号,2023年,第61~75页;[日]兰信三:《日本における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の展開と課題》,《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9号,2023年,第76~93页。

② 关于日本口述历史学会的国际交流,参见[日]中尾知代:《JOHAの始まり——忘れられた“JOHA準備会”と初期メンバーからみるJOHA》,《日本オーラル・ヒストリー研究》第19号,2023年,第14~15页。